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书系 / 民族志丛书
何明◎主编

边缘的游弋

——一个边疆少数民族村庄近60年变迁

邦建斌◎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 边 缘 的 游 击 —— 一个 边 疆 少 数 民 族 村 庄 近 5 0 年 变 迁 ↓

边缘①的游弋

——一个边疆少数民族村庄近60年变迁

郭建斌◎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边缘的游弋：一个边疆少数民族村庄近60年变迁 / 郭建斌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9
ISBN 978-7-222-06671-7

I.①边… II.①郭… III.①乡村—社会变迁—研究—怒江傈僳族
自治州 IV.①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54310号

责任编辑：朱海涛

装帧设计：马 滨

责任印制：洪中丽

《边缘的游弋——一个边疆少数民族村庄近60年变迁》
郭建斌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13.75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2010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6671-7

定 价 42.00元

继承“魁阁”传统 推动民族志研究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书系·民族志丛书》总序

何明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

“民族志”(ethnography)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作为作品的民族志，即民族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写作的文本；其二是作为过程的民族志，即田野工作(Fieldwork)^①。前者依赖于后者，没有文本撰写者的田野工作过程和调查内容记述，就没有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民族志作品；但民族志文本却不等于田野工作，不是对田野调查内容的简单记述，而是以田野工作为基础进行理论建构的产物。

民族志是现代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学术生产的核心产品。在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领域，民族志被视为古典人类学与现代人类学的分野，前者被称为“摇椅上的人类学”或“书斋里的人类学”：学者们不从事系统的田野工作，其学术成果也不是通过民族志的方式表达，学术研究和理论建构的资料来源大都是旅行家、传教士、殖民者、船员等曾目睹过异文化的人士所撰写的文字资料和历史档案文献，民族学家/文化人类学家们不进行系统的田野调查，不撰写系统的民族志。从19世纪末起，文化人类学开始从古典向现代转型，其标志便是英国动物

^① Alan Barnard and Jonathan Spencer, *Encyclopedia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p.193,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5.

学家兼人类学家哈登（Alfred Cort Haddon）在1898—1899年两次率领剑桥大学的考察队赴托雷斯海峡进行田野调查并完成了六卷本的调查报告和英国功能主义的代表性人物马林诺斯基（B.K.Malinowski）通过1914—1918年之间三次到新几内亚进行调查所撰写的民族志作品《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此后，民族志成为现代民族学/人类学必不可少的核心性工作，并成为现代民族学/人类学的基本学术范式。其主要创新之处在于，“它将先前主要由业余学者或其他人员在非西方社会中进行的资料搜集活动以及由从事学术理论研究的专业人类学者在摇椅上进行的理论建构和分析活动结合成一个整体化的学术与职业实践”^①。在现代学科体系中，田野调查和民族志通常被视为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学术方法特质，尽管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方法经现代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发明并规范之后被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众多学科所援用，但没有哪一个学科像民族学/文化人类学那样把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当作不可或缺的学术实践，也未能像民族学/文化人类学那样建构了如此系统的田野工作范式和完成了如此之多的民族志经典文本。

民族志是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学术创新的基础和关键。社会文化的描述与理论解释是民族志缺一不可的要素。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总结自己对花蓝瑶和江村的两次调查时深刻地指出：“在实地调查时没有理论作导线，所得的材料是零星的，没有意义的。我虽然在这一堆材料中，片断地缀成一书，但全书并没有一贯的理论，不能把所有的事实全部组成在一个

^① [美] 乔治·E.马尔库斯、米卡尔·M.J.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王铭铭、蓝达居译，第3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主题之下，这是件无可讳言的缺点。”^①只有抽象理论论证而没有深入细致的田野资料的学术文本，是“演绎理性”的理论论著，而不是民族志，至少不是令人信服的有价值的民族志；只有社会文化资料的排列堆砌而无周密系统的思想观点或理论解释的文本，只能视为“调查资料”，最多称之为“田野报告”，而不是民族志，至少不是具有学术创新意义上的民族志。从功能主义、结构主义、互动理论到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后现代人类学，每一次学术流派的更迭创新，都是围绕着民族志展开的。没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翅》等民族志，就没有在国际占有一席之地的中国民族学/人类学。

云南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曾经是中国组织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学术实践的重要机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办人吴文藻先生在40年代初与燕京大学合作创办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研究室（因抗日战争期间曾迁到昆明近郊呈贡县魁阁而被称为“魁阁”）。“魁阁”组织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田野调查与民族志撰写工作，完成了《云南三村》（费孝通、张之毅著）、《祖荫下》（许烺光著）、《芒市边民的摆》（田汝康著）等一批中国早期民族志研究的经典作品，创造了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鼎盛时期。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迄今未能撰写出“魁阁”时代那样得到学界认同和广泛影响的民族志作品，这既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发展滞后的表征，也是学界对民族志研究重视程度不足的结果。有感于此，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于2008年4月恢复与重建“魁阁”研究室，旨在弘扬吴文藻、费孝通等老一辈人类学家、民

① 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第12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族学家的求真务实精神和实地研究传统，以民族志的学术生产为龙头，全面推进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创新和学科建设。在“西南边疆研究书系”专门设置“民族志丛书”，遴选出一部分选题具有较高价值、田野调查深入细致、理论阐述较为完整、撰写较为规范的部分成果纳入其中出版，便是这一学科建设理念的具体行动。

当然，学术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优秀的民族志也不可能呼之即来。纳入“民族志丛书”的作品，是有志于从事民族志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努力的结果，能否被学界和社会认可，既需要同仁们的不懈努力，也需要时间的检验。

我们对于“魁阁”精神，“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村庄近50年变迁
——边缘的游弋——
一个边疆少数民族
目录

导 言 / 001

- 一、问题的提出 / 002
- 二、“国家—社会”框架 / 008
- 三、“边缘的游弋”：一个操作性概念 / 016
- 四、本书的结构安排 / 022

聚焦冷木当 / 034

- 一、公共设施 / 038
- 二、家庭和人口 / 043
- 三、村庄及家族 / 062

第一阶段 1950至1973 / 069

- 一、身份“钦定” / 072
- 二、“直接过渡” / 081
- 三、开挖水田及其农业合作化 / 095
- 四、学校 / 116
- 五、商店 / 136
- 六、文面及其传统建构 / 148

村庄近60年变迁——一个边疆少数民族
边缘的游牧——
目录

第二阶段 1973至1999 / 165

- 一、“乡制”改革 / 168
- 二、“包交提留” / 179
- 三、地膜玉米 / 195
- 四、修路 / 208
- 五、市场化浪潮 / 220
- 六、文化传统的断裂与延续 / 235

第三阶段 1999至2008 / 246

- 一、基督教传入 / 249
- 二、电视进村 / 258
- 三、村民“自治” / 268
- 四、退耕还林 / 285
- 五、“林改” / 298
- 六、非正常死亡 / 308

附录 / 322

- 一、为丁巴举行的“索拉乔” / 323
- 二、为宜松举行的“木索哇” / 330
- 三、一间“汉族房子”的诞生 / 337
- 四、一个非正常死亡者的葬礼 / 349
- 五、亲历“卡锵哇” / 371
- 六、都里的五封来信 / 386

结语：独乡一年 / 399

参考文献 / 415

后记 / 426

导 言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这本书中所写的村庄——冷木当，在最近七八年中，我以研究论文、田野笔记、民族志、论著等方式多次或多或少地提到过。以往所写的，主要是侧重于某个方面，讲得最多的是电视。现在要从这个村庄的60年变迁的角度来写，对我来说，需要对这个村庄60年的发展历程有一个整体把握，同时，在具体叙述时，又面临一个讲什么、不讲什么的问题。在此需要申明的是，我对这个村庄社会变迁所做的考察，肯定不是对这个村庄历史的还原，而是作者在一个特定的叙述框架下所做的一种讲述。前一个问题对我来说已经具有一定难度，在多次对这个村庄的调查中，尽可能地去收集那些想到的材料，随着材料的不断积累，我对于这个村庄的认识和理解，似乎正朝着一个相反的方向在发展，如同一个和你朝夕相处的人，一旦要你对他/她进行一种全面的介绍，一种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油然而生，随之而来的更可怕的问题是：我是否真的了解他/她？一个村庄如同一个人，正如俗语所说的：“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也是常理。这方面的困难还不是最难解决的，抱着一种讲述的过程同样是一个增进理解的过程的想法，讲得不对的地方以后改正就是，这绝不是为自己可能的信口雌黄做一种预先的辩解，而是想说其实这也是很多从事类似研究的人或许会有共同感受。如果说通过这样具有某种自我解脱式的辩解使得我自己对于前一个难题有所释然，那么，后一个难题，也即如何讲述的问题，我该如何去解决？

李培林在《村落的终结》一书中曾对中国早期人类学研究中的叙事策略进行过总结，归纳出了“文本概括法”和“文学概括法”两类方法（李培林，2004：155—156）。前者以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和李景汉先生的《定县社会调查》为代表，解释是：“把调查的资料和受访者的话语，慢慢地咀嚼，然后转化成比较精炼、比较条理化的文本语言表达出来。”

（李培林，2004：155）对于后者，李培林提供的例子是林耀华先生的《金翼》，他对这种方法的解释是：“把调查的原材料进一步加工成文学的语言，更具体地说，是小说的语言，它不舍弃生活语言中那些鲜活的东西，而是把调查的一些片段、零碎、芜杂的原材料，转化为一个完整的故事，就像是一部小说，因为小说的原意，就是区别于‘文本大说’的市井故事。”（李培林，2004：156）李培林的这种归纳很有见地，也很有启发，但是我也感觉到这样的归纳过于把眼光落在叙述策略层面，遮蔽了一些民族志文本书写中更为重要的问题，即通过这个民族志文本的写作要说明什么。无论使用什么样的叙事策略，通过这样一些策略所完成的民族志文本，总是为了说明某些方面的问题的。因此，我在这里所遇到的讲述的困难不仅仅是叙述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研究问题层面的困难。这个时候，我不能仅仅去问如何讲述，还要问我讲了这些东西之后想说明什么。

关于社会变迁的研究，是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显学”，但是这类研究中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是问题意识缺乏。套用美国学者韦恩·C.布斯等人（Wayne C. Booth, Gregory G. Colomb, and Joseph M. Williams）在《研究技巧》（the craft of research, 2008）一书中所使用的表述，“社会

变迁”只是一个话题（topic），还没有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research problem）。也就是说，围绕这样一个话题，讲什么？不讲什么？甚至怎么讲？都取决于我们的问题是什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和波普尔所说的“知识起源于问题”（波普尔，1998：2）是相同的。反之，没有问题，就没有新的知识增加，而只是陈旧知识的不断重复。^①就“村庄社会变迁”这样一个话题进行提问，通常容易想到的问题是：这个村庄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内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还有一个表面上看起来类似，但实际是有差别的提问：这个村庄在某个特定时间段的各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这两个问题的差别在于，联系前面李培林教授所做的分类，前一个问题更适合采用“文本概括型”的叙述策略，后一个问题则更适合采用“文学概括型”的叙述策略。

李培林教授的《农民的终结》一书在内容上分为两大部分，作者这样一种做法是要达到整合以上两种叙述策略的目的，这是一种很大的学术野心，同时也是值得鼓励的一种学术创造，但是我总觉得李培林教授在这里有为自己一时无法找到一种合适的整合那些访谈材料和他自己的论题（农民的终结）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进行合理辩解的嫌疑，因为那样一种截然对立的两个部分，虽然两种不同的叙述策略都有，但并不能说就是把两种叙述策略很好地整合了。因此在我看来，叙述策略还不是最根本的，这种叙述策略的整合的背后，其实是研究问题的整合。回到我就社会变迁所提出的两个问题，如果说要

① 在此还要说明的是，并非说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促成那种波普尔所说的知识的增加，这既取决于问题的真伪，还取决于问题的指向。波普尔在这里所说的问题，应该是一种理论建构型的问题。

实现叙述策略的整合，也就是说要把“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两个问题很好地整合。在这一点上，我个人觉得孙立平等人提出来的“过程—事件”分析是进行这种整合的一种较好的方法。但是，即便是“过程—事件”分析，它主要还是一种方法，不是最终目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仅仅只是停留在上述两个问题上，还不能完全解决我对这个村庄变迁的叙述方面困惑。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虽然民族志大多已经放弃了那种对于规律的探求，从而转向一种文化的阐释或是对具体生活情境中的意义的探寻（或者说是如同格尔兹所说的“深描”）。这样一种转向，美国人类学家里拉·阿布—鲁赫德（Lila Abu-Lughod）曾做过归纳，她这样写道：

作为“当代人类学”或是“当代变化、转型人类学”的部分产物，早期的对于亲属制度的兴趣已经被性别研究所取代，或是被由新的再生产技术开启的不确定性改变了方向；宗教和宇宙学研究转向了对公共政治或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分析；政治体系的比较研究被对族群的文化建构、暴力（或非暴力）的意义、行政运作方式，或是地方的、全国的、国际的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探索所取代；文化研究作为一个整体，甚至文化自身，被怀疑为同质化和受操纵团体、否认了人的历史、具体化实践以及去本土化。文化开始转向对于内部差异探索，如同那些基于种族或是认同的其他形式、历史的转型，或是权力与文化、文明形成之间的联系。（Lila Abu-Lughod, 2005: 25）

里拉·阿布—鲁赫德在这里所归纳的这种人类学的转向与人类学由对规律的探寻的科学转向意义的阐释的趋势并无不同，只不过是她把很多问题具体化了。在我看来，人类学的这

种转向可以简要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由于主题的相关性，在这里只能是一个提纲式的，暂时不展开说明：

1. 从宏观视野转为中观或微观视野。以往人类学对于亲属制度、文化模式等方面所进行探讨，是在一种宏观视野下对于一般性意义的探寻，这一点在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格尔兹等人的研究中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2. 权力分析。这是当代人类学研究、文化研究等等对欧洲法兰克福学派批判传统的一种继承，在人类学领域，最为直接的表达是马尔库斯等人所说的“作为一种文化批评的人类学”（马尔库斯等，1998）。

3. 社会关系网络。无论是格尔兹所说的那种作为“意义之网”的文化，还是里拉·阿布—鲁赫德在上述归纳中所说到的各种关联，还是布尔迪厄所使用的“场域”（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1998）概念，“社会关系网络”都是共同关注的焦点。我上面所说的权力分析，其落脚点也是在“社会关系网络”上。

基于这样的认识，再回来看我前面说到的两个问题，我也感觉到仅仅停留在那样的一些问题上还未真正触及我目前面临的这种讲述的困惑。这时，我要问的是：这个村庄在这个特定时期内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以及具体的变化方式说明了什么？是什么促使了这样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动力来自何方？具体到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来说，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建设（包括政权建设、社会治理等方面）对于这样一个村庄起到了怎样影响？这样的一些问题，我要结合上述人类学研究的转向来做几点补充说明：第一，它不是要去寻找某种规律，第二是对村庄内部以及外部社会关系网络的一种考察，第三，国家权

力将是我要关注的重点。

在基本的问题明确之后，在这里还想就有关叙述方式方面的问题做一点具体说明。在讲述关于这个村庄变迁的故事时，可以选择的脚本也是多样的。该丛书编委会提供了一个参考脚本，这个脚本是从历史沿革、环境、人口、民族、组织、农业、林业、畜牧业、交通、通信、文化、教育等方面来进行讲述。在我看来，这样一个脚本用作进行田野调查时的指导性框架是有价值的，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志书写的脚本（或框架），它有很多不足，具体表现为：（1）这是一个静态的结构性框架，适用于任何一个田野调查地点，完全按这样一个静态的结构框架来进行民族志撰写无法体现不同个案的特点；（2）既然这样一个框架主要是进行田野调查的指导性框架，因此它就不具有进行理论分析或解释的效力，如果套用这样一个调查指导性框架来撰写民族志，无法对田野资料进行“深描”；（3）这样一个框架固然是一个非常全面的框架，但问题在于这样一个貌似完整的框架中的具体内容之间缺乏一种有机的联系，各部分内容自成一体，这样的民族志如同一个导游手册，每个景点的介绍都非常详尽，但是却缺乏一个有机的线索（主题或主线）把这些零碎的内容串在一起。因此，本书在写作时才尝试着去建立一个新的框架，并使得该村落的60年变迁能够在这样一个框架中得到合理的呈现。